

思想启蒙与 文化复兴

五四思想史论

洪峻峰／著



人民出版社

思想启蒙与

文化复兴

五四思想史论

洪峻峰／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卢永勤

责任校对:赵立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洪峻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 7-01-006000-2

I. 思… II. 洪… III. 五四运动(1919)-研究 IV. 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3272 号

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

SIXIANG QIMENG YU WENHUA FUXING

——五四思想史论

洪峻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33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01-006000-2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引 论	(1)
-----	-----

一、概念的分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	(1)
-------------------	-----

二、性质的诠释:思想启蒙、文艺复兴与反传统	(9)
-----------------------	-----

三、内容的拓展:思想与学术	(19)
---------------	------

四、思想的探究:主题与脉理	(26)
---------------	------

第一章 启蒙思想的形成	(37)
-------------	------

第一节 政治改制中的文化难题	(37)
----------------	------

1. 国民程度不足	(38)
-----------	------

2. 难题的突现	(45)
----------	------

第二节 启蒙课题的提出	(51)
-------------	------

1. 辛亥革命的震荡与回应	(52)
---------------	------

2. 从救亡到启蒙	(58)
-----------	------

3. 启蒙思路与传统思想模式	(65)
----------------	------

第三节 目标与对象的选择	(68)
--------------	------

1. 以改造青年思想为旨	(68)
--------------	------

2. 政治与伦理的双重觉悟	(73)
---------------	------

第四节 道德启蒙与伦理觉悟	(81)
1. “人”的意义的发现	(82)
2. 伦理价值观的转换	(88)
3. 困窘与迷失	(92)
第二章 文学革命的意义	(97)
第一节 寻找思想启蒙的手段	(97)
1. 历史根源与现实动因	(97)
2. 思想启蒙运动的呼唤	(100)
3. “遵命文学”的产生	(106)
第二节 文学革命的启蒙意义	(109)
1. 语言革新与思想革新	(110)
2. 从文学启蒙到启蒙文学	(118)
第三节 白话文运动的策略	(127)
1. 逼出对手	(127)
2. 历史的提示	(133)
3. “国语文学”的示范	(136)
第四节 重申与重估	(142)
1. 《学衡》与“估《学衡》”	(143)
2. 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	(151)
3. “重估”论辨析	(163)
第三章 反传统的得失	(172)
第一节 反传统的进程与特征	(172)

1. “五四反传统”辨析	(173)
2. 反传统的演进	(177)
3. “全盘性反传统”的特征	(183)
4. 文化偏至与历史必然	(188)
第二节 反传统的实绩	(194)
1. 道统的否定	(195)
2. 学统的解构	(199)
3. 文统的革命	(204)
第三节 反传统的难题	(207)
1. “断裂”说辩驳	(208)
2. 民族认同的难题	(210)
3. 文化重建的难题	(213)
第四章 启蒙进路的歧异	(218)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时代	(218)
1. 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形成	(219)
2. 新文化人的歧路与分化	(226)
3. 文化运动新势力的兴起	(231)
第二节 普及与提高的分歧	(242)
1. 两种思路之争	(242)
2. 提高:创造新文明	(247)
3. 普及:建立新社会	(251)
第三节 问题与主义的冲突	(262)
1. 问题与主义之争	(262)

2. “社会主义”研究与论战	(274)
第五章 文化方略的改换	(289)
第一节 新文化观的转变	(289)
1. 现代性与传统	(290)
2. 进步观念与中西古今之争	(292)
3. 从欧化到综合创造	(298)
第二节 文艺复兴的追求	(307)
1. “五四文艺复兴”说	(308)
2. 回望“轴心时代”	(316)
3. 复兴与再生	(324)
第三节 激进与保守的张力	(329)
1. 对传统资源的不同择取	(329)
2.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争	(334)
3. 科玄论战与汉宋之争	(346)
第六章 再造文明的努力	(353)
第一节 寻找新文明的根基	(353)
1. 整理国故主张的提出	(355)
2. 重释、还真与评判	(360)
第二节 传统资源的开发	(367)
1. 白话文学传统的追寻	(368)
2. 科学方法传统的探究	(373)
3. 疑古思想传统的发掘	(383)

第三节 整理国故运动的困厄	(394)
1. 《新青年》同人的多重反应	(394)
2. 国粹主义的勃兴	(400)
3. “古史辨”的得失	(410)
4. 预期目标的改变	(414)
征引书目	(419)
后 记	(432)

引 论

“五四”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长久不衰的学术话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五四思想文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也是争论最多、观点最为混杂的研究领域。在这里,先对“五四”研究的争议问题和既有成果作一些梳理,同时也对本书的“五四”观作一个简要的阐述。

一、概念的分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

“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概念,即指五四时代或五四时期;这个时期以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命名。其次,“五四”也指五四运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活动或历史事件的集合。

“五四运动”是个涵盖面很广、意义宽泛又有歧义的概念。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在其1960年出版的名著《五四运动史》的“导言”中,对“五四运动”的概念进行了梳理。正如他所说的,对“五四运动”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概念是否包括了学生及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方面?^①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页。

“五四运动”一词是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事件后出现的,其最初含义是指这次“五四事件”。因此,历来有人对“五四运动”作狭义的理解,认为它专指学生爱国运动,不包括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有人认为两个运动没有多少关联,力图贬低新文化运动对学生运动的影响,以突出“五四运动”的爱国意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虽然两个运动有着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密切关系,但新文化运动是独立的,不能被包容在“五四运动”的范畴之内。许多“五四”当事人持这种观点,他们力图强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罗家伦1942年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说:“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早于五四,如《新青年》、《新潮》的出版均早于五四运动二年或一年。五四运动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终究是两回事。不过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更加弥漫。”^①胡适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一变再变,但也多次申述这种观点。他于1928年作题为《五四运动纪念》的演讲,一方面把五四运动限定为以1919年“五四事件”为代表的学生爱国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也讲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②1935年5月,他在《纪念“五四”》一文中,一方面追溯“五四运动”这个名词的出处和最初含义,另一方面又追溯这个运动的起源,把它与此前的思想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指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绝不会有‘五四运动’”。^③到了晚年,胡适又一再强调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不相干,甚至对立。1960年他在一次关于“五四”的谈话中称,“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回事,五

① 转引自罗志田:《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见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② 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730页。

③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574—576页、580页。

四运动既帮助了文艺复兴,又害了它,使它变了质。^①

多数人则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认为它既指以1919年“五四事件”为代表的学生爱国政治运动,也包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这种观点几十年来在我国政治思想界和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把“五四”或五四运动的精神和意义概括为反帝反封建,就涵盖了这两种运动。

从历史看,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政治运动是前几年思想启蒙的结果,而学生运动又推动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只有把二者包容于一体,才能真正揭示那一时期的历史巨变。显然,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

但是也必须看到,“五四”学生爱国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各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和使命,把它们统一起来,容易导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独特意义理解的偏差。例如,1925年瞿秋白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中写道:“民国七八年来的思想革命运动,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得到一时期的充分发展……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②他把学生爱国运动和思想革命都包容于“五四”之中,但强调在政治层面上应看到“五四”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意义。1935年5月,胡适在发表《纪念“五四”》之后,紧接着又发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接受张熙若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个人

① 参见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854—856页。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主义的观点,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胡适说:“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新思潮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①但他同时强调:“‘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是具有世界主义色彩。^②显然,胡适担心把新文化运动包容于五四运动的范畴之内,会使它混同于民族主义。因为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与民族主义是对立的。1929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曾论述二者的对立。

可见,对五四运动的广义理解,隐藏着一个危险,就是掩盖了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意义。或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民族主义的理解,而模糊了它的思想启蒙的历史意义,如胡适所担心的。或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爱国政治运动的一个环节而包容于其中,在政治革命的大框架内来定位。以前我们讲五四运动史,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个论述框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思路,在提升了‘五四’的革命性的同时,也挤压和抽取了‘五四’内涵中的思想文化容量。”^③

20世纪80年代“五四”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在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理解的前提下,进一步区分“五四”或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政治运动,厘清了二者的区别与关联,从而彰显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在当时的“新启蒙”对“五四”的推崇中,突出了“五四”的思想意义、启蒙意义,重新明确把新文化运动归结为

①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585页。

②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587页。

③ 郑家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第二章第三节“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视野中的‘五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2页。

思想启蒙运动。

这种区分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① 这个论断以二者对立的极端形式,把救亡与启蒙二者鲜明地区分开来,影响很大。但是,由此也造成了对“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紧张和歧解,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或救亡促进启蒙的纷争。与此同时,胡适晚年关于政治运动干扰文化运动、使文化运动中断的观点,也随之再度流行。因此,政治与文化、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尤其是五四启蒙的结局问题,成为“五四”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关于五四启蒙的结局问题,大体说来,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启蒙中断论流行;20 世纪 90 年代初,反中断说出现。于是,形成了中断论与承续论两种观点的对立和论争。

五四启蒙中断的观点,其实早在五四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胡适早在 1923 年 12 月,在致《努力》同人的信中就说过:

《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②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也是以此论为前提的,即认为五四启蒙的任务未完成,所以要发动新启蒙以继承其未竟之业。

①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原载《走向未来》1986 年创刊号,收入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17 页。

20 世纪 80 年代启蒙中断论的理论阐述,主要在于阐释启蒙中断的原因。影响最大的是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美国学者薇娜·舒衡哲在其所著《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①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救亡与启蒙不是对立的,启蒙就是为救亡服务的,是救亡的方式、手段,二者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并列的关系。其实,他们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乃是说救亡的政治斗争压倒启蒙的文化运动;政治斗争与启蒙运动都是救亡的方式,说一种方式压倒另一种方式,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中国的救亡必然是民族主义的运动,而启蒙虽然最终为了救亡,但它是通过建立民主制度这一中间环节的,即启蒙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建立民主制度,通过这一目标而达到民族振兴的根本目标;启蒙追求的是民主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救亡与启蒙的纠缠即表现为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纠缠。总之,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义,即形式上政治斗争挤掉了文化运动,性质上民族主义盖过了民主主义。且不论历史情境如何,从理论上,这一观点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救亡压倒启蒙”说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只是一种外因论。从外部原因探讨启蒙的结局固然是一条途径,但不是根本的途径,还必须从内部原因即启蒙自身的发展分析其结局,揭示其必然性。正如汪晖所说:“‘救亡压倒启蒙’作为一种历史描述是用历史情境的变迁来解释启蒙的解体,在这一特定视角之内,这一判断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一判断没有解释思想启蒙运动是否存在自我瓦解的因素……外部情境必须转化为思想史的问题才能有效地解释思

^① 薇娜·舒衡哲(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该书最初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于 1986 年出版。

想的变迁动因。”^①基于这种见解,汪晖在《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四’启蒙运动在提出它的一系列基本命题的时候,是否已经存在自我瓦解的因素?‘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悲剧性命运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客观的历史情势?”^②他认为五四启蒙的命题中包含着反命题,“五四”后反命题突出,从而使五四启蒙走向裂变。汪晖的见解在于从启蒙自身内部的原因分析其走向,提供了探讨五四启蒙结局问题的另一条思路。当然,把五四启蒙的走向视同命题的运演,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实际运动的结局归因于命题的变化,则未免夸大了主观因素。

关于五四启蒙结局的“承续”论,也有多种阐述。最主要的是认为,“五四”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把思想启蒙具体落实到行动上,使五四启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得到继承和发展。

那么,五四启蒙是否中断?回答这个问题可能着眼于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就五四启蒙的最初目标而言,这个目标是达到,或者半途而废?第二,就历史所要求的、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启蒙而言,即是否已达到历史的要求、满足时代的需要?应该说,就启蒙者的最初目标,即促使一代青年的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而言,启蒙的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然而,我们现在往往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是否中断,而是从现代化的要求的角度来看待,因而认为五四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四启蒙所产生的效应和意义,早已超出第一方面,而达到第二方面。五四启蒙的这个结果,也是超出陈独秀

① 汪晖:《“历史同一性”及其形成与解体》,见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② 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第4页。

等启蒙者最初意图的。

一场运动有始必有终。关于五四启蒙的终结问题,可以有多种理解和阐述。例如,启蒙运动完成了自身的使命而结束,启蒙运动因外力冲击而中断,等等。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欧洲启蒙运动历史走向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对我们也很有启迪。德国学者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精神发展过程的阐述,着力于探究启蒙如何因自身发展演变而走向反面;他们所谓的“启蒙的辩证法”,“就是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①德国学者 E. 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则分析了欧洲启蒙运动如何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总结而转向新的形态,即通过休谟和卢梭的批判、康德的总结而走向终结。“休谟的怀疑论通过对科学知识真理性的分析动摇了理性的权威,而卢梭则以其社会政治理论揭示了理性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启蒙主义的内在矛盾公开化了。”^②

实际上,五四启蒙运动的走向和结局,与 E. 卡西勒所分析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走向,有诸多相似之处。五四启蒙的自我反思开始于 1919 年“五四事件”前后,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民主政治的反思,推动了五四后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胡适等人对反传统和文学革命的反思,导致了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和传统资源的开发。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中译本序”第 3 页。

② 张志伟:《启蒙主义的精神和它的难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也有类似休谟和卢梭的批判。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破产、科学破产情形的介绍,可以说类似卢梭的冲击;而科玄论战中玄学派提出的科学的局限性问题的,类似休谟对科学理性的否定,玄学派提出的科学管不到人生观问题,类似于康德的革命。正是因为他们对五四启蒙思想的批判直接导致了五四启蒙运动的终结,所以,中国思想史界一般以1923年“科玄论战”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结束的标志。

二、性质的诠释:思想启蒙、文艺复兴与反传统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热潮中,人们一般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思想启蒙运动,以思想启蒙来表述“五四”的性质和意义,并加以肯定和阐扬。与此同时,海外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也传入国内。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另一是把“五四”的意义和精神实质归结为“反传统”或“全盘性反传统”,并由此对“五四”进行批评。这几种“五四”诠释(有的学者表述为“五四记忆”或历史记忆、民族记忆等,有的学者则表述为“五四话语”、“五四观”)各有理论渊源,都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只不过在过去一个历史阶段中,被爱国、革命的诠释话语所掩盖。新时期对“五四”的诠释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这种诠释多元化局面的重新出现,是新时期以来“五四”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学界对各种“五四”诠释的归纳,可谓见仁见智。较多的是按照五四以来的思想流派来梳理、归纳。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的最后一章,把各种各样的“五四”阐释和评价,归结为自由主义者的观点、